

交际
语言
译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美〕

罗纳德·斯考伦
苏珊·王·斯考伦 著

施家炜 译

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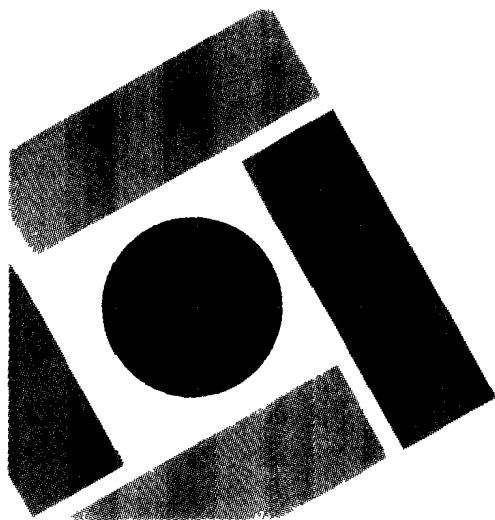


交际语言译丛

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罗纳德·斯考伦 苏珊·王·斯考伦 著
施家炜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著;施家炜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

(交际语言译丛)

ISBN 7-80149-533-0

I. 跨… II. ①罗… ②苏… ③施… III. 人间交往-语义分析-研究 IV. 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618 号

·交际语言译丛·

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



著 者: 罗纳德·斯考伦 苏珊·王·斯考伦

译 者: 施家炜

责任编辑: 致远 罗琳

责任校对: 张景秋 同文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533-0/B·090

定价: 22.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178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by Ronald Scollon and Suzanne Wong Scollon

Copyright © Ronald Scollon and Suzanne Wong Scollon, 1995

First published 1995

Reprinted 1995 (twice), 1996 (twice), 1997
(twice)

经英国 Blackwell 出版公司许可据 1995 年版译出



总序

《交际语言译丛》介绍的是国外交际社会语言学领域有影响的著作。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西方语言学界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一个语言学流派。其特点是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虽然交际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实际上是一门交叉学科，跟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关系非常密切。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交际社会语言学，它的兴起需要有一个成熟的社会语言学作为前提。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则是对结构语言学的反动。西方现代语言学起始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语言的系统性的观点，认为语言的符号只有在系统中、在和其他的符号对立中才有意义。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发现对立统一的系统，确定什么样的初始要素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初始要素是没有对立意义的。索绪尔的理论中有许多重要观点，最著名的是关于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的区分。言语指具体的语言运用，即一次次内容形式不尽相同的具体讲话。语言指的是一个潜在的系统，该系统能反映出多变的言语活动背后的稳定的规



律。这个观念有它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激励语言学家从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背后找到系统的规律，从而脱离传统语言学局限于经典考据的羁绊，使语言研究上升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个观念的负面影响是，它促使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跟具体的社会交际以及具体的语言环境相脱节。这种思路到了后来在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把它推向了极端。乔姆斯基明确提出，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理想社区中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可是，由于理想的状态和理想的语言说者是不可能得到的，语言学家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语感，语言学的研究也就成了对个人语感的研究。在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中，一对比较重要的概念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前者指的是看得见、听得着的外在语言形式，后者指的是一些抽象的范畴。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即转换生成的过程——成了语法学家的一个主要任务。这样一来，语法理论所关注的就离语言的实际运用越来越远了。

正如甘柏兹所说，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极端结构语言学的实践假设了（1）人类言语行为可以用一个语法系统的集合来描写。（2）语言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的作用不过是传达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以及语词组合时的语法关系。（3）对语言的理解是从语音开始，逐步上升到单词、短语、句子等较大单位。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这些假设没有一个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假定每个社区只有一种语言系统是过于天真了；事实上，双语或多语才是更普遍的现象。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通过对实际语言的调查，发现了大量的语言变异现象。变异现象不仅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网络有关，也和使用者的交际环境有关。这些发现说明，脱离社会现实的语言研究即使不是带误导性的也是非常片面的。从言语交际的过程



来看，人们在交际的时候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同时进行的。

早期的社会语言学偏重于变异、变项和变体的研究，也就是低层次语言单位的研究，并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上解释变异现象。随着研究的进步，有一批社会语言学家把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连续的谈话和篇章方面。这跟功能语言学派中的话语分析学派的发展是平行的。他们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利用什么手段组织话语（说话人的角度）和理解话语（听话人的角度）；如果交际产生困难，这种困难是缘何而起的。这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就被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社会语言学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的共同基础是主张把语言放置到大的社会环境下进行考察，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团的语言实践：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影响语言的发展。交际社会语言学的最重要发现是，会话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罗列语词的过程。人们在会话过程中既要利用语法词汇的知识，也要了解语义框架和解读话语的线索，包括各种各样的语用知识。研究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在会话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何跟这些知识相互影响就成了交际社会语言学最主要的任务。

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一般上认为与高夫曼（Goffman）以及布朗（Brown）、列文森（Levinson）等人对所谓礼貌现象（politeness phenomena）所作的论述有很大关系。高夫曼曾经指出，谈话人在交谈时需要满足两种面子要求——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所谓积极面子就是在交流时参与者要表现出跟别人十分融洽（show involvement with others），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要得罪谈话对象。罗宾·雷可夫（Robin Lakoff）也指出，语言形式的选择常常遵循着一种和睦原则（Rule of Rapport），这种原则可以解释谈话中的一种常



见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因为出于为对方考虑而不直接说出他们要说的意思。布朗和列文森（1987）进一步把这些问题总结为普遍礼貌原则（Universals of Politeness），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交际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是甘柏兹（John Gumperz）。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是谈话的指示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甘柏兹的这个概念跟海姆斯的“格调”（Key）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它们共同来源于白森（Bateson, 1972）的框架（Framing）的说法。白森认为，没有一个语句的含义可以离开一个合适的框架而得到解释。例如，任何一个正常的语句都可以作几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一个本来是严肃的命题，只要说话人把这个意思用开玩笑或讽刺之类的口气说出来，这句话就有可能被理解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讽刺、开玩笑和严肃的陈述就是不同的话语框架，相应的语气就是指示这些框架的语言线索。在文献中，有的学者还把类似框架这样的概念追溯到哲学家皮尔士（Peirce）关于符号的引得属性（Indexicality of Sign）的理论。框架在词汇语义学和交际社会语言学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在交际社会语言学中，实际交际中语言的表达的性质也被解释成谈话人之间的话语框架交换的过程。

把不同的言语成分看作是谈话的指示线索，这里有一个关于什么是语言的假设。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的一些特征被看作是语言的核心特征，另外一些则是边缘特征。他所谓的核心特征是能够区别所指意义的特征，包括音段音位、词缀、句法范畴等。而像语调、话语节奏等特征都被看作是无关宏旨的边缘性特征。而交际社会语言学认为，结构语言学家对语言信号的理解过于狭窄了，这些所谓的边缘特征往往是构成交际信号系统的非



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具有实实在在的交际意义。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句法词汇的范畴，而是语言手段的各个方面，包括音律的和非言语的特征，包括习惯说法、套语等。甘柏兹的研究把那些在正统语言学中向来不受人重视的现象（如音律、套话等）的意义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交际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是面对面的自然谈话。这些材料常用音像记录下来并加以转写。在这些方面，交际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相互借鉴，关系密切。

由于交际社会语言学对语言信号的理解是广义的，非言语交际（手势、身态、视线等）也成了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亚当·肯顿（Adam Kendon）的研究具有领先地位。肯顿在60年代就利用电影拍摄技术研究交际过程中身态和视线的作用，并提出了F—组合系统等概念。这种研究手段本来只在心理学领域得到运用，经过肯顿等人的推广，在其他社会学科，如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人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的深入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目前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利用音像技术研究非言语交际成为一个趋势。

交际社会语言学除了受到经典社会语言学的影响外，交际民族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对它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交际民族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注重研究跟语言交际相关的民俗文化方面的因素。其研究方法往往需要研究者长期居住在一个社区，观察这个社区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研究者能在最大程度上以一个本地人的眼光解读交际代码系统及其文化意义。交际民族志学重视交际环境的构成部分，包括不同类型的交际对象。交际民族志学的代表人物是海姆斯（Dell Hymes）。他也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语言学家。



交际社会语言学跟研究跨文化的交际的学派时有重叠，因为两者都研究交际的策略。不过交际社会语言学注重研究同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的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而跨文化的交际研究常常涉及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交流。不过交际社会语言学没有必要，事实上也并不排斥涉及不同种族和民族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本译丛系列之一的斯考伦夫妇所著《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一书实际上对以上两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另外一个对交际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影响的学派是社会学中的会话分析学派。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不是指任何对会话的研究，而是一个专门的学派 (在英文文献中常用 CA 代替)。这个学派把交谈看作是一种有结构规律可循的社会活动。会话分析对日常会话的结构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分析的概念和工具 (例如话轮和话轮转移 [turning taking], 谈话修复机制 [repair], 语对 [adjacency pairs], 话语评价 [assessments] 等)，给交际社会语言学家提供了一套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例如目前美国最有名的交际社会语言学家谭楠 (Tannen) 就特别注意研究美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谈话时对话轮转移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人们对插话、沉默长度等现象的理解和容忍等。谭楠也特别强调谈话的协调性或节律性，认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人对谈话的节律是非常敏感的——何时接话，如何接话，可否重复别人的话，什么时候可以打断别人的话等等，正常的谈话人对此都有很清楚的意识和期望。

本译丛首批入选作品三种，代表了交际社会语言学的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其作者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家。其中甘柏兹的《会话策略》一书是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经典之作。该书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委托甘柏兹主编的“交际社会

语言学丛书”之第一种。内容涉及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和方法论。由于这本书是奠基之作，后出作品没有不受其影响的。本书在1982年初版之后，在1983，1984，1985，1987，1988，1989，1992，1994，1995和1998年十次再版。

甘柏兹是交际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原为英国学者，后长期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目前为该校荣誉终身教授，并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参加教学活动，同时继续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交际社会语言学丛书”主编。甘柏兹早期的研究兴趣是双语和多语问题以及文化人类学，调查过北欧和南亚多语现象。后来研究重点转向伦敦和英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进而转向交际社会语言学。

《行为互动》是剑桥“交际社会语言学丛书”的第七种。作者是亚当·肯顿。肯顿出生在英国，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生物学和试验心理学。肯顿是研究人类在自然（非试验状态）交际过程中非言语交际因素的先驱。作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著作，很多是这方面的经典。肯顿目前在美国费城地区从事独立研究。

《行为互动》一书收集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发表过的五篇最著名的论文以及其他若干论文。每篇旧论文后面都有作者的后记，回顾该文发表后的最新进展。虽然书中所收文章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英语文化范围内（肯顿后来的研究涉及澳洲土著语言和意大利语），但该书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系统的方法论（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复杂的摄像及动作的转写技术）会对汉语的研究起到启发作用。

斯考伦夫妇所著《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代表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向——跨文化的交际。作者有文化人类学的功底，其研究范围包括人们所熟悉的大语言（英语、汉语〔广东话〕等），除了在美国和亚洲（中国台湾、韩国）



多所大学（包括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外，也曾给五十多个政府及大企业的部门提供交际方面的咨询服务。

本书发挥了作者的专长，对跨文化交际的有关问题作了综合性的介绍。其重点是专业（商业、金融、法律等）领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具有突出的应用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在于比较亚洲人和英美人在交际文化方面的不同，分析实例多取自香港、台湾和韩国。所以，本书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论和亚洲文化的具体问题的有机结合，适用于亚洲专业人士和研究者。本书出版后得到国际间著名学者（如谭楠）的高度评价，认为“在这类研究题目上无出其右者”。

我国在交际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研究队伍还没有形成。这是我们把西方交际社会语言学引介到国内的一个主要动机。交际社会语言学紧扣社会文化问题研究语言，研究交际的过程和效果，这种研究有其先天的优势：它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也可能把语言学带入社会集体意识之中（谭楠的交际社会语言学论著曾经在美国创下语言学书籍高踞流行图书榜首的纪录）。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怨语言学在社会上不受重视，作为语言学家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走向社会而不是远离社会。加强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贯为推动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不遗余力，这次又在责任编辑罗琳等的推动下组织出版这套翻译丛书，令我们感佩。在编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原书作者的协助，对此我们非常感谢。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交际社会语言学在我国的流布起到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我们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陶红印

2000年8月2日于北京



原版丛书主编序

“语言与社会”丛书系列中，有部分著作是探讨言语民族志学课题的，而《跨文化交际》一书则吸纳了过去20年中这一领域在理论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以大量的极为重要的描述性工作（包括作者自己的在内）为基础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同时，这本书已触及到应用社会语言学领域，它可能因而更为引人注目。《跨文化交际》一书不仅理论雄厚，描述丰富，而且还探讨了从社会语言学研究出发，能为职业交际的实践寻求到何种结论。这本书以实践为重点，这使其成为超越于社会语言学和外语教学领域而产生深远影响的先锋。作者最后的结论是慎重而又矛盾的，即职业交际的专家们正是那些开始意识到自己仍缺乏这方面专业知识技能的人。然而，《跨文化交际》一书的读者们不仅将意识到人类话语系统中能发现多少变体，还将认识到像斯考伦夫妇这样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在描述和理解这些系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彼得·特鲁吉尔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职业交际的书。当我们作为西方人或亚洲人一起做生意时，当我们作为男性或女性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时，当我们作为老年人或年轻人共同生产一种产品时，我们就处于所谓的“跨话语系统交际”中。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话语或亚洲人的话语，男性的话语或女性的话语，社团的话语或我们的职业组织的话语，所有这些将我们包进了一个语言“信封”中，这个“信封”给了我们一个身份，它使我们同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交际时更加容易。但同时，我们文化群体的话语、我们社团文化的话语、我们职业的特殊话语或者我们的性别、世代的话语，又使我们理解那些来自不同群体成员的话语时更加困难。我们把这些封裹的话语叫做“话语系统”。

我们用“跨话语系统交际”（interdiscourse 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来包括跨越群体或话语系统边缘的所有交际，从最广阔的文化群体间的话语交际，到发生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或者处于不同世代的同事之间的交际。在作跨话语系统分析时，我们将考察当话语跨越群体成员资格的边界时被创造和诠释的方式，还将考察作为职业交际人士，我们用交际去获取和展现自己复杂而又多元的身份的



方式。

这是一本关于西方人和东亚人（特别是中国人）之间用英语进行跨文化职业交际的书；但并不仅止于此。它探讨组织机构间的交际，特别是当社团文化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发生冲突时；但它还不止于此。它还探讨跨越所谓代沟的交际和男性与女性之间发生的交际失误，本书还提供了一种分析那些跨越话语系统边界的话语的交际社会语言学框架。正因为每一个职业交际者同时是某个社团、职业、世代、性别、文化以及其他话语系统的成员，本书的焦点便在于分析在所有的职业交际中，那些多元化的成员资格是如何建构起一个框架的。

职业交际中的话语分析是一个新生的而又发展迅速的领域，这一领域将跨文化交际研究、应用交际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等融合为统一整体。我们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学生和教师在职业交际、专用英语等英语课程或其他重点在于职业或商务交际的类似课程中的需要。本书适于课堂教学或自学使用，许多参与跨文化职业交际的人已完成了该类课程的学习，并正活跃于他们各自的职业中。

我们认为本书有两种主要的读者群：（1）东亚国家说英语的职业交际者和在亚洲或其他地区教授职业交际课程的教师们；（2）与跨越话语系统边界的交际密切相关的职业交际者。本书曾在香港试用，因此比较强调那些与汉语（粤语）人群中的说英语者最直接相关的例子。然而本书的研究覆盖了更为广泛的英语交际领域，包括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

在北美以及台湾和韩国 20 多年的关于跨文化机构内交际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发音与语法等语言学习的各方面十分重要，但是大多数的交际失误并不是发音偏误或语法糟糕造成的。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中，交际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话语模式的差异。我们在北美和亚洲的主



要商业机构、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当某一群体因为不能破译另一群体的话语规则而无法理解对方意图时，便会频繁地出现群体间的交际失误，甚至引发敌意。我们教授了一系列的课程，从“制度习俗中的文化差异”到关于话语、社会语言学以及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习得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话语分析的这一较高层面，对交际的高度关注引发了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能力和为改善群体间交际而进行谈话修复的能力。在这本书中，我们首次将一系列不同领域的研究整合成特别为职业交际者而设计的统一体。

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台湾沙鲁的神学院和韩国汉城的索刚大学索刚英语国际语言学院的支持。我们还得到了来自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阿拉斯加人文学科论坛”（国家资助的人文学科项目）和阿拉斯加海因斯的“林恩运河保护项目”持续的基金支持。我们感谢这两所大学以及这两个基金组织对我们研究工作的支持。当然，对于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这些机构不负任何责任。

我们写作此书的重要基础在于我们与研究同行之间关于话语的不断讨论。我们书中的大部分方法应归功于同约翰·甘柏兹的关于群体间话语的讨论。我们要感谢德伯拉·谭楠对本书草稿以及本书所参考的许多其他文献所作的尖锐生动的论辩。我们还要感谢蒂姆·鲍斯伍德，他作为香港城市理工大学英语职业交际项目的协调员，对于本书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我们曾经将这本书的草稿作为不同课程的教科书在香港城市理工大学和香港浸会学院试用。学习那些课程的学生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一些事例，这些事例大大提高了本书的清晰性。我们感谢他们的兴趣和敏锐的观察力。我们非常感谢大卫·李召兴的许多好的意见，这些意见使我们关于中国



文化事件的叙述更加清楚，我们在同他讨论本书内容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朱蒂和威克也给了我们尖锐而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感谢汤姆·斯考伦在准备本书图示时的帮助以及理查尔·斯考伦在编辑工作中的帮助。我们深深地感谢以上所有人以及其他许多使我们观点更加明确的人，同时我们自身仍感到对此书中的不当之处应负有责任。